

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

桐城文派

王 献 永 著

中 华 书 局

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

桐 城 文 派

王 献 永 著

中 华 书 局

责任编辑：赵伯陶

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

桐城文派

王献永著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新兴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6 印张·118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定价：3.90元

ISBN 7—101—00672—8 / I·103

序

王献永同志早在六十年代初即在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精研邃密，为学甚勤。其后在省委宣传部及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理论与编审工作，并致力于鲁迅研究，造诣日深，声誉鹊起。近年于《江淮论坛》，开辟“桐城派研究”专栏，在学术界影响颇大。

“桐城派”绵历二百余年，作者遍南北，糟粕精华，往往交错；毁誉是非，久已不一。献永同志今以科学的文艺理论为指导，以鲁迅研究古典文学之精神为依归，本实事求是之旨，对“桐城派”作系统的研究。沉浸浓郁，荡涤陈腐，条理始终，原原本本，遂乃著成专书，洋洋十万言。虽采前人之说，而更多出于己见，自有“桐城派”以来，以科学理论研究之，前此尚未有也。

我在早年，曾从姚仲实、袁伯夔诸先生粗闻“桐城”作文之法。中年以后，自审不贤，甘于识小，稍治训诂、目录之学，不复究心于词章。前闻海城于君自言为“半个桐城人”，盖谓其通读古书，实由马、姚诸老启之。因念：桐城老辈所论文章之法，多为汉语使用之公例，为读书、作文所必知。盖文学为语言之艺术，而达情尽意之巧，桐城诸老所言尤为深切著明。故合语言与文学为一科，由桐城诸老之言论、评点，以探篇章语言之规律，则词章与训诂可通，而惜抱所谓汉宋合一者，庶

其在此。

读献永同志之书，深为叹佩！附赘数言，以待商榷。

吴 孟 复

引 言

作为封建文学正宗的桐城文派，其递变兴衰的命运几乎是与清王朝的国运相始终的。它以方苞倡导古文“义法”为标志，开始于康熙年间，中经刘大櫆的拓展，兴盛于乾隆时代的姚鼐。这之后，曾一度中落，又经曾国藩于道光年间的所谓“中兴”，最后衰败覆灭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时期，前后延绵二百余年。当其兴盛之时，天下之士，争相归之，其势力以安徽桐城为中心，遍及江苏、山东、江西、河北、湖南、广西、天津、上海等地。据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及其《补遗》中的不完全统计，其成员多达近千人，内有女子二人，日本人二名。当其衰败之日，被斥为“桐城谬种”，几乎不再有人问津。这样一个文学流派，时间之长，声势之赫，流衍之广，影响之大，毁誉之不一，在我国文学史上，实属罕见，只有“江西诗派”，可与之相比。桐城文派在产生、发展、递变及衰亡的过程中，不仅体现了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性，而且还有着它自己的特殊性。

我们知道，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对于所谓世道人心等意识形态是起着绝对主宰和统帅作用的，而以反映世道、人心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也就不能不受其主宰和统帅。因此，传统的儒家观点一直认为：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是“本”，是“道”，而文学则是“末”，是“载道”

的工具,是隶属于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的附庸,所谓“文以载道”便是这种文学观最简明的概括。这种政治的功利主义和工具论的文学观,从汉代的《诗大序》开始形成体系以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才从与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密切关系中被解放出来,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为增强,文艺仍然是要“载道”的,只是所载的“道”的内容不同罢了。所以说,这种政治的功利主义和工具论的文学观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从古至今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基本面貌。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桐城文派,把这种封建的“文以载道”观发展到最为完备的形态。他们以“义法”为核心的文论及其古文写作,正是这一文艺观的典型体现和具体实践。他们极力主张“文统”与“道统”、“治统”的一致,坚持文统为道统和治统服务。特别是桐城派的后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桐城派的后继者们,不仅顽固地坚持这种政治的功利主义和工具论的文学观,还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种文学观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具体地转化为一种仕途经济,把桐城古文变为一种跻身仕途的敲门砖,他们既是文人,又是封建官僚、政客。出现在他们笔下的大都是些政治说教、歌功颂德、庸俗应酬以及瞒和骗的文学,艺术价值甚低。但是,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桐城文派的全然否定。应当承认,在众多的桐城派成员中也有这么一部分人,他们一方面坚持“文以载道”,另一方面又比较地能够注意文学的独立性、特殊性以及作家的主体性,能够潜心于文学自身规律的探索,甘心做个文人。他们比较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审美价值以及潜移默化的美感教育作用等,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如桐城

三祖中的姚鼐、刘大猷便是这方面较为突出的代表,应当得到适当的肯定。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对当时清统治者所提倡、所肯定、所利用的桐城“义法”及其古文写作思想政治倾向,也应当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绝非凡是统治者所提倡、所肯定的就一定是错误的、反动的,这便是其历史的复杂性。

这些情况,无疑说明了桐城文派不仅具有中国封建社会文学和文化的一般特征,而且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现今,在我们对于传统文化重新估价的大讨论中,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桐城文派认真加以剖析研究,弄清它特殊而又普遍的规律、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是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

时至今日,对桐城派的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就,但一般还只是就人论人、就文论文、就事论事,并且大多侧重于文论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是很缺乏、很不够的。在对于桐城文派的具体评价上,往往也随着客观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波动,而且,这种波动的频率和幅度是很不小的。如果政治思想上开放一些,对它的肯定就多些,评价就高些;反之,就低些,甚至于全盘否定,因为这里直接涉及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最敏感的问题。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形成较为一致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定论。这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要求我们将此研究作进一步深入。

对于桐城文派,只能把它作为一种历史的客观存在加以分析、研究。笔者并非一定要寻出它的多少优点,更不是出于对故乡的偏爱,为同乡先辈多争得几分荣光,而主要是为了给这一颇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以科学的解释及适当的历史地位。

这本小书便试图在前人研究讨论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即从其产生、发展、衰亡的全过程中,进行较为系统的综合性探讨,将每个桐城派作家放到桐城派兴衰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去考查其地位、作用和影响,变单个的、孤立的作家研究为系列性的综合性分析;变较为单纯的文论或作品研究为历史的、文化的和文学的综合性研究。在方法上,拟以史为线,以论为纲,史论结合,对桐城派进行概括性的评述。当然,这只是笔者努力达到的主观意向,与其实际成效并非一码事。由于个人水平有限,肯定很难尽如人意,这只好留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了。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桐城文派的产生、创立	
一 从“派”说起	1
二 桐城文派产生的历史条件	7
三 桐城文派奠基者方苞	12
四 戴名世与桐城文派之关系	26
五 刘大櫆在桐城文派开创中的地位、作用	33
第二章 桐城文派的兴盛发展	
一 姚鼐的生平、思想及其时代	49
二 姚鼐的文学理论及古文实践	55
三 姚鼐的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 方东树、姚莹	66
四 阳湖派与桐城文派	77
五 湘乡派与桐城文派	88
第三章 桐城文派的衰败灭亡	
一 封建意识形态的日趋解体从根本上 动摇了桐城文派的存在	101
二 桐城文派在“正宗”的道路上走入了 历史的尽头	107
三 桐城文派的历史命运与“五四”文学革命	115

第四章 桐城文派的功过是非

- 一 怎样看待桐城文派····· 126
- 二 思想、政治上的保守、落后性与文学观上
 的某些科学性····· 128
- 三 桐城古文内容上的缺陷与艺术上的
 具体成就····· 132
- 四 桐城文派在我国散文艺术发展史上的
 地位、影响····· 142
- 五 对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也要作具体分析····· 146

第五章 桐城文派的历史经验、教训

- 一 在复古的旗号下进行文学革新是中国
 古代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 149
- 二 文学离不开政治,但又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152
- 三 文学发展在于不断创新····· 155

附录 “五四”以来桐城派研究讨论情况综述

- 一 对于桐城派的总体评价····· 161
- 二 关于桐城派的思想政治倾向····· 165
- 三 关于桐城派与程、朱理学及汉学之关系····· 167
- 四 关于桐城派的艺术倾向及其成就····· 168
- 五 关于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 169
- 六 关于桐城派的文论····· 170
- 七 关于桐城派与阳湖派之关系····· 173
- 八 关于桐城派与湘乡派之关系····· 174
- 九 对于桐城派末代作家严复、林纾的评价问题····· 176

后 记 ····· 179

第一章 桐城文派的产生、创立

一 从“派”说起

一谈起“派”，人们往往赋予它现代的社会政治内涵，很自然地把它同组织上、政治上的宗派联系起来，因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这派那派，五花八门，有的是自觉组织的，有的是自然形成的，有的是后人给加上的。它们自身的性质及其派别之间的矛盾斗争也极为复杂。所以，人们一提到派，总觉得这是一个不大好的称呼。其实，如果说的是文学艺术流派或学术理论派别的“派”，那倒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它们独特的形式和内容，标志了其艺术的特性，并非全是贬义。

桐城派是怎样形成的，属文派还是学派？关于这些问题，郭绍虞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有段话说得较为切合实际：

桐城文之成派，即因桐城文人之文论有其一贯的主张之故。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发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

这里,既说明了它之所以成派的原因,又说明了它作为派的性质和成派的特点。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派别,总是以共同的思想倾向或一定的组织关系为基础的。凡文派,大体上有这么两种情形:一、自觉组成的派别、集团,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二、非自觉的小型社会群体——在某一作家群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原则,只是靠着基本相同的文艺主张和创作倾向进行着思想情感和事业上的交往,没有派别的自觉性。至于“派”的称谓,往往是他人或后人,根据他们的特点予以概括出来的。桐城文派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形,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派别,主要是由于这一群体作家之间的大致相同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倾向所起的作用。

在文论方面,桐城文派有着共同一贯的古文“义法”的文学主张。方苞首倡的“义法”之说,既包涵了“文”与“道”的统一,又包涵了文章本身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从表面上看,方苞似乎重在“道”,而不在“文”,所谓“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①，“望溪先生之文,体正而法严,其于道也,一以程朱理学为归”^②,都似乎说明方苞是在强调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儒家之道的重要。但是,方苞同时还提出了道德文章的理想境界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③,将“道”与“文”相提并论。并且,他还说过,“文”虽“小术”,“失其传者七百年”^④,特意强调了这“小术”之文的重要。可见,他所讲的“道”或“理”,显然属文中之“道”,或文中之“理”,并非纯粹理论形态的孔孟儒家之道;他所重的道,总是与“文”相联系、密不可分的。

刘大櫆更为直截了当地把所谓“义理”看作是文章的材

料,而不认为是文人之“能事”。于是他干脆撇开儒家之道的“义理”不谈,专讲文人为文之“能事”。所谓“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云云^⑤,已纯属文艺学的理论范畴了,大大地超出了方苞“义法”说的文章学范畴。

姚鼐将义理、考据、辞章熔于一炉,强调了为文的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以及“阴阳刚柔”的文学风格论,开始进入较高艺术层次的探讨,使方苞以“义法”为核心的理论逐步地有所深化、遂成系统,基本上形成了桐城文派的古文理论体系。

由此可见,作为桐城派三祖的方、刘、姚,尽管他们的学识、才力及其文学见解、主张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始终离不开古文之“义法”这一根本性问题,一般都可以说是对这一基本命题的延伸和发展。所以方东树认为“三祖”,“如鼎足之不可废一”,“无不若出于一师之所传”。可以说,“义法”之说实际上已成了桐城文派共同的理论基础。桐城“三祖”之后的众多门人弟子及“阳湖”、“湘乡”等支派,在文学理论和主张上,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歧异,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批评、论争,但基本上都离不开“义法”这一理论核心,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是对这块理论基石的充实、阐发或修正,并不违背这一“义法”理论的共同基础。

在创作方面,桐城古文家们在其基本一致的文论指导下,有着大体一致的文学创作倾向,这种倾向是以清正雅洁为特点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古文作品,语言上,较为通畅简明,言之有物;立意布局、结构层次谨严有序,相当讲究;抒写比较自

由,虽宗唐宋,但不像拟古派那样泥古不化,剿袭字句,而是有着较为切实的内容和艺术个性。这正如胡适所说的:“唐宋八家之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做假古董。”^⑥ 这便成了二百余年桐城文派的作家们不约而同的基本一致的文章倾向。郭绍虞先生认为“桐城古文之所以能通于古又适于今”,正在于其“雅洁”之故,“惟雅故能通于古,惟洁故能适于今。是桐城古文所以能为清代古文中坚的理由”。很显然,大体一致的古文创作倾向便成了桐城文派所以成派的又一重要原因。

姚鼐的大弟子方东树曾指出方、刘、姚之为儒:“盖非特一邑之士,亦非特天下之士,而百世之士也。虽其人气象不侔,学问造詣不侔,文章体态不侔,要其足通古作者之津,而得其真,无不若出于一师之所传。”^⑦ 这便从总体上揭示了桐城“三祖”所以能够成派的根本原因在于一脉相承、如出一师的基本相同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倾向。

桐城文派是在清代古文实践中,逐步自然形成的非自觉的小型社会群体,而非某个人或几个人有意组织而成的。当方苞倡导“义法”之时,所虑及的只是清统治者思想、政治、文化统治的需要,并没有想到去自觉地创立一个声势浩大的文派、学派之类;刘大槐时期,虽已有了人数众多的嫡传和私淑弟子,在文论和古文实践方面也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他也未曾想到和提及所谓派的问题。姚鼐时期,实际上归隸“桐城”者,已人多势众、蔚然成派;然而姚鼐只不过借周永年、程晋芳之戏言提到所谓“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一言,也还没有公然打出“桐城派”的旗号。李详在《论桐城派》中就这样认为:

“乾隆中程鱼门（晋芳）与姚姬传先生相习，谓：‘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此乃一时兴到之言，姬传先生犹不敢承。”^⑧公然宣称“桐城”为派、正式打出派的旗号来的，是这稍后的曾国藩。

我们知道，事实上桐城文派到了姚鼐时期，已正式形成并达于鼎盛。姚鼐之后，随着清王朝国运的衰败，它便逐渐地衰落下去。当是时，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起家的曾国藩，不仅为清统治者建树了“武功”，也想在“文治”上试试锋芒，显露一手；他不仅要在政治上“中兴”清王朝，而且在文化上，还试图“中兴”桐城文派于“文蔽道衰”的危机之中。于是，他便以“派”为号召，一方面以桐城私淑弟子自许，并自任首脑组织起桐城支派的“湘乡派”；另一方面，对于桐城派，特别是对“三祖”极尽吹捧，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写道：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櫟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响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紧接着他又叙及了姚鼐时期及其以后，“桐城”发展成派的情形：

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均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嬗之后进，义无所止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絮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絮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众，有陈学受菽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

吴嘉宾子序，皆承絮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瓚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这就公然将桐城宗派的旗号亮了出来。他在1859年2月所写的《圣哲画像记》中将姚鼐列为中国从古至今的三十二圣哲之一，与文武、周公、孔孟并列^⑨。另外，曾国藩还根据姚鼐接受了戴震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主张，硬说姚鼐是反汉学的。曾国藩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他显然是在以政论文、以派论学、论人，将桐城文派染上了浓厚的宗派色彩，并试图将它树为政治和思想派别的一支，更直接有效地服务于清王朝的统治。在文学方面，使桐城派直接与同治、光绪年间发生、发展起来的新兴文学潮流相对抗，以至后来，以桐城派末代作家林纾为代表的桐城古文派在与“五四”新文学相反对的过程中，较为自觉地结成了反动没落封建文人的一帮。

上述事实表明，桐城派基本上是在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非自觉的小型社会群体，这正像它末期的代表人物马其昶所说的：“古今为文者众矣，然而深浅离合之际 其辨之严，世固有能审雅宴之声而别溜卤之味者，宗派之说即有其起焉。”^⑩应当说，桐城派的早期和中期，无论是其嫡传，还是与“阳湖”、“湘乡”等支派之间，单就其成员各自的理论主张而言，虽有这样那样的歧异、矛盾，但基本上都是以古文“义法”为核心，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宗，上溯先秦两汉，以清通雅洁为其古文写作的基本艺术倾向。这便决定了它属文派，而不属学派。关于这一点，吴敏树说得明确：“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